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新世纪版

The Global Gamble

华盛顿的 全球赌博

〔英〕彼得·高恩 著
顾薇 金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译
精品
新世纪版



**华盛顿的
全球赌博**

The Global Gambl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盛顿的全球赌博/[英]高恩著;顾薇、金芳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书名原文:The Global Gamble
ISBN 7-214-03368-2
I. 华… II. ①高… ②顾… ③金… III. 经济政
策—研究—美国 IV.F1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5773号

The Global Gamble
Copyright © 1999 by Peter Cow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2 by JSPPI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2-044号

书 名	华盛顿的全球赌博
著 者	[英]彼得·高恩
译 者	顾 薇 金 芳
责任编辑	戴亦梁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江苏中印刷厂
印 刷 者	南通市先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368-2 I · 716
定 价	25.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书凡自装封套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全球化赌博

引言	7
二 “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	12
三 美元—华尔街体系	27
四 美元—华尔街体系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演变	53
五 权力政治、美元—华尔街体系和克林顿政府	82
六 1998 年恐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	142
七 结论	174

第二部分 全球化时期的政治格局

八 海湾战争、伊拉克和西方自由主义	192
九 东欧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	253
十 新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	332
十一 东方后共产主义党派	348
十二 北约与欧盟的扩大	390

前 言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政府和美国商界精英尝试进行“全球化”,换言之,它们试图使美国成为 21 世纪控制全球主要经济和政治局面的强权国家。这一点对那些关注世界局势的人而言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美国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方法,他们可能就不那么了解了。本书就探讨了其中的一些方法及其影响。

从历史角度来看,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西欧以法律统治的形式建立帝国,进行扩张,而美国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美国扩张的主要特点是试图把主权国家这一国际性制度作为其全球主宰机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的国内局势是由来自共产主义和其他左翼运动的威胁决定的,而外部局势则是由美苏竞争决定的,上述这两种背景促使这些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接受美国的“领导”。但是随着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衰退与解体,美国必须寻求新的方法,使世界各国继续聚集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并对美国的经济优势重新定位。

克林顿政府执行的美国冷战后的全球计划涉及两种新的方法,用来改变其他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局势,使它们朝着继续接受美国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方向发展。国内局势的这种转化是打着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旗号进行的:这包括国内社会关系朝着有利于贷方和食利者的方向转化,生产部门越来越从属于金融部门,财富、权利和社会保障离劳动大众越来越远。

国家外部局势的转化是以全球化的名义进行的:这包括向

核心国家打开本国的政治经济市场,允许它们的产品、公司、资金和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使本国的国家政策依附于华盛顿、纽约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发展和决策。

上述这两种转化相辅相成:国内社会力量关系的变化,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使赞同全球化的社会团体强大了起来,而支持全球化的社会团体同样支持这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的转化。有些国家和社会体制试图抵制这些转变,但结果是,它们将发现它们越来越被美国市场及其同盟——欧盟市场排斥在外,并遭受经济制裁。即使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生产部门,由于害怕这种排斥,也会转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这两种变化都有利于美国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扩大,因为它们不仅向美国的跨国合作,而且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都提供了开放的条件。

早在苏联国家集团解体之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就在西方社会传播了开来,但美国政府是在 90 年代才开始积极地推广和普及这些运动,并对这些运动进行了特殊的诠释的,这种诠释使其他的政治经济国家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而这种捆绑过程既通过双边努力来完成,也通过修改多边组织章程,使它们成为这些运动的工具而实现。

国内和国家间跨国关系的这些变化渐渐造成了一种新的体系,而这种体系反过来又慢慢使得其他国家的领导层与美国政府和商界精英的需求趋向一致。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又确保了其他国家必须对发生在它们本国的一切情况承担全部责任。这样一来,美国将得到全球跨国新秩序的种种好处,而随之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则被分散到了美国国外。这就是美国全球计划与众不同的主要形式。这就是全球赌博。

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一段并不十分顺利的开头,主

要的西欧国家已成了这一计划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合作伙伴,与美国的关系既是下级军官般的俯首听命似的合作关系,又带有一些摩擦和竞争。而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则充满着更多的冲突,因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区域性发展远不如西欧来得与美国的全球计划合拍。

人们通常认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是技术和/或经济的力量,而非美国政府和商界精英的政治能力和资本主义利益。但是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提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由美国政府建立的——特殊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相关的国际金融体系使美国得到了巨大的政治权力,而全球化的进程主要就是由这种政治权力所推动的。一旦了解了现行货币、金融体系的性质,我们就能了解它是如何被连续几届美国政府用做国家经济策略的强有力的工具的,以及美国政府是如何利用这一工具推动全球化进程和与此相关的新自由主义国内转变的。

本书的第二部分研究了全球赌博时代国际政治的诸多方面。“沙漠风暴”之后对伊拉克的长期封锁很好地说明了一点,即美国有能力排斥并打击对其控制进行抵制的国家。有关这一话题的章节主要描述了美国如何通过利用所谓的自由价值,来对这类封锁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自圆其说。书中这一部分的其他章节研究了大西洋区域国家为把有利于它们的体系强加于东中欧及东欧国家所作努力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尾章节指出,华盛顿政府决心通过北约扩张来维护对西欧的政治领导,这种做法必将给欧洲安全带来新的威胁。

全球化运动主要的可笑之处在于,虽然有人坚持说它是由于经济和技术的有机变化,而非政治的影响而产生并发展的,但实际上它却给经济带来了不稳定,而且在经济上可能是行不通

的。全球化运动随后导致了长期的金融动荡,并系统化地在最脆弱和最敏感的国家中造成经济崩溃,同时它也容易在那些紧跟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把国家命运与证券市场的运作联系在一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形成繁荣—衰退交替循环的极端形式。但是迄今为止,这种经济上的弱点却一直与政治上异乎寻常的成功结合在了一起: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从未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威胁或挑战。

然而这种政治上的成功是由于 90 年代这十年中存在的两种特殊情况造成的。首先是国际左翼运动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劳工运动的衰退;其次,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同盟国”形成了服从于美国领导的习惯。但是这两种情况不可能永远存在。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记住全球赌博的机会成本,也就是未走道路的潜在成本:美国政府及其从属的大西洋区域合作伙伴对建立 21 世纪更具包容性、更制度化的全球政府体系(包括国家之间以及国内社会两者)的任何尝试所表现出的不屑一顾。

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使美国商界精英受到了一种诱惑,令人想起了浮士德。一道门似乎被打开了,美国人看到了迄今为止无法想像的巨大的世界性权力。然而仅仅在短短的十年中,靡非斯特(魔鬼)的印迹已经显现了出来。“华盛顿共识”的经济配方在结构上就存在缺陷,但同时它对美国的经济活力却是很重要的。美国非常成功地使许多国家完成了国内重组,但在某些方面这却使这些国家将来控制并管理国内冲突的能力大大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远远大于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国家,但是在国家崩溃和人民反抗的情况下,这种力量的展示毫无用处。

本书并未试图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这些国际发展提出一个全面的对策,本书只是研究了国际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方面。这些研究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什么十分完善的、自以为是的道理,

而是被称为经验的东西。

经验之一是,大西洋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并不透明,它们在对公众的宣传中很少涉及它们的运作目标。西方国家外交部的特点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特点,媒体宣传从不涉及这些方面。再加上国家和许多多边组织的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从不对公众公开,这就使得人们很难了解西方国家策略。如果民主的公众舆论要想行使它的职责,去影响所在国家的政府行为,那么我们必须了解政府是如何使用这些国家权力,以及是为何目的而使用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轻信国家政策。同时,我还发现,这通常还要求我们去研究细节,采用“后退制图法”,从实际政策造成的后果中反推出有关政策目标的假设。

经验之二是,虽然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强权国家的国家策略经常是漏洞百出并且不合时宜的,但是从技巧和细节上来看却是相当复杂、相当神秘、相当高深的。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当代国家策略包括了传统的外交强制手段之外的许多其他政策工具,其中心是一系列的国家经济策略以及市场管理和信息管理的工具。

现在国家行政当局所采用的政策是各种工具和策略的综合,但学者们并未运用各种社会科学原则的对等综合去研究国家政策,许多现实力量起作用的区域似乎并不与专业学术上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或政治科学)原则所涵盖的区域相吻合。本书所作的研究要求我游离在原则界限之间,虽然在有些地方我并不觉得自己具备这么做的条件。

书中第二部分的内容有些已以文章的形式发表过,另一些则摘自早先发表的论文。第八章最早刊登于《新左派评论》第187期(1991年5—6月),标题为《海湾战争、伊拉克和西方自由主义》。第九章发表于《新左派评论》第213期(1995年9—10

月),标题为《东欧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第十章发表于《从劳工的角度关注东欧》第 53 期(1996 年夏),标题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第十一章的最早版本发表于教育出版社多纳得·萨森的《向左看》(IB Tauris, 1997),标题为《东方后共产主义党派》。第十二章的最早版本发表于《从劳工的角度关注东欧》第 56 期(1997 年春),标题为《欧洲扩张》。我在此感谢这些出版商,感谢他们允许我重新使用这些材料。

第一部分

全球化赌博

导 言

20 世纪 90 年代是全球化的年代,在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印迹。但是全球化的印迹愈是到处可见,人们对于全球化本身愈是觉得难以琢磨。大量的学术研究并未能够就它的形式所涉及的范围达成共识,左翼和右翼的一些知名学者甚至对它的存在都抱怀疑态度。而另外一些人,主要是英美国家的记者和政治家们则坚持说全球化是一头巨兽,它将吞噬一切不尊重它需求的东西。他们认为全球化的目光“如太阳般空洞无情”,这种目光投向苏联国家集团、欧洲社会模式、东亚发展模式,无不使它们一一屈服。在这些权威人士看来,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星际文明的使者,它将带来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一个风险社会,一个超越国家管辖的世界,它是一股无法阻挡的、半自然的全球转化力量。

然而,随着东亚危机渐渐演化为全球国际金融恐慌,那些“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操纵者,那些被认为是在全球化舞台上大展拳脚的人士,却在思考全球化是否已在经历垂死前的阵痛。1998 年初,美国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的高级分析师乔·昆兰提

出全球化已走到了尽头的可能性。他提到“全球化是这十年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现象”，他强调：“美国社会和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最多的利益……全球资本的移动速度越快，就会有越多的资本可供选择，而无须动用国家本身不那么可观的储蓄，也会有越多的资本来促进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简而言之，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牛市。”但是昆兰担心的是，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政府可能在渐渐地反对全球化，它们可能决定要在 1998 年结束全球化进程。他这样说道：“明年世界经济的最大风险不是发展延缓，而是全球互相依赖格局的瓦解——随之带来全球化的终结。”所以对昆兰来说，全球化是一个相当脆弱的东西，依赖于国家的扶持而存在。

就这样，我们意识到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中确实存在一股强劲的新力量，我们称之为全球化。但我们对全球化的轮廓、动态及起因，仍然知之甚少。对我们而言，它就像漆黑的屋子中的一只黑猫一样不可捉摸。^①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只是捕捉全球化这只黑猫的又一次尝试，或与其说是抓猫尝试，不如说是试着抓住一件它的主要器官：它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认为它的中枢神经系统存在于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在 20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中进行重新设计和管理的方式之中。货币和金融的这种新体系是称之为全球化的整个动态系统的互联机制的中央发动机之一，而且这种新体系绝非是经济和技术有机活动过程的自然产物，它完全是某一个国家——美国的历届政府所作的政治决策的政治结果。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更倾向于摩根·斯坦力的观点，即全球化是一种依赖于国家政策的现象，而非英美国家媒体人士所鼓吹的另一种观点，即全球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为说明全球化在国际现实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姑且称之为一种“体系”，

但它并不是美国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的准法律意义上的“体系”，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解释说明。

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总是领先于国家的经济，而且也特别是政治决策的产物。如果在研究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涉及 1973 年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方面，那么这种研究就无法发现全球化动态发展的主要特点。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既是国际“经济体系”，又是国家经济政策和权力政治的潜在工具，我们在此称之为“美元—华尔街体系”(DWSR)。我们将试图研究这种体系的演变过程：从 20 世纪 70 年代体系的建立到 80 年代和 90 年代体系下的国际经济政治，直至亚洲危机和 1998 年的恐慌。

我们并不是在说，通过研究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在 20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中的发展，我们就了解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正如罗伯特·布瑞那所证明的，长期经济不景气这些问题源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危机。经济长期萧条的产生为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改革提供了合适的背景，但是生产危机并没有决定反应的形式，还是有一系列的方案可供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的。美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而最终选择的方案也就反映了这一点，这种方案导致了我們称之为全球化现象的产生。从 70 年代起，尼克松政府推行的这种方案渐渐发展成了一种模式化了的不不断重复的国际体系，对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届美国政府都对这一体系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而最异乎寻常的是，美国政府由此获得的这种巨大的杠杆力量在大部分有关全球化、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总体发展的文献中都被完全忽略了。

我们无须使用代数或几何，甚至几乎无须使用算术或统计来研究美元—华尔街体系，即使一点都不熟悉新古典主义经济

学,也完全能理解该体系的基本关系和概念。确实,要理解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不了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奥妙反而是一种绝对的优势。

本书的第一部分,研究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首先我们简短地讨论了一些术语,这些术语与“资本市场”的含义以及金融系统的作用和形式有关。在第三章中,我们研究了尼克松政府在70年代为国际货币关系建立的新机制,而随之产生的体系既为美国政府也为英美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杠杆利益,这一体系的诱人特色之一是: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金融市场上的国际私人金融机构和美国政府的美元政策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有关全球化的绝大部分文献都倾向于建立这么一种主要假设,即市场能力(和市场动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对立为主——这种假设带有深深的自由主义的色彩。然而塞缪尔·亨廷顿在尼克松变革时期写的一篇启发性的文章指出,这一观念是十分错误的:“有关民族国家走向灭亡的预言是不成熟的……它们似乎是基于一种零和假设……即跨国组织力量的增长必定伴随着国家权力的衰退。然而这并不一定如此。”我们试图去研究由美国政府操纵的“美元—华尔街体系”是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运作,如何依附并改变了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以及国际间关系的。

第四章是关于“美元—华尔街”体系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中的运作情况的。我们研究了美国政府如何寻求利用这一体系,以及欧盟国家、日本、南部地区国家和原苏联国家集团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此外,我们还研究了这一体系在美国国内金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在第五章中,我们试图把美元—华尔街体系及其作用放入90年代早期整个世界政治的动态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也就是

说,我们从在世界上占主导的国家即美国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而且我们试图在美国领导人建立战略目标和重新组合策略的过程中考虑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所产生的影响。我认为,他们理应而且也确实认识到了他们主要的挑战来自于东亚和东南亚。为了对付这一挑战,也为了挫败将来可能出现的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威胁,美国领导人不得不大力鼓吹美元—华尔街体系,而且还可能在东亚地区把这一体系用做国家经济政策的一种工具;我们有一些间接的但却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在第六章中我们对一种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种观点认为,完全是因为市场力量才点燃了1997年秋天开始的东亚危机的导火线,即韩国危机。但我们认为,是美国财政部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在韩国的经济危机中,美国财政部实行了一些新的做法,而正是美国财政部在韩国的这种干涉行为应该为随后产生的印尼危机负责任,而且这种干涉行为也间接地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最终使东亚危机演变成了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尽管这并非是有意识行为。而之所以美国财政部的行为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这么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美国20年来一直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这种控制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最后我们提出,是否有另一种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策略来扭转全球化的动态进程。

注:

① 我必须承认,这一比喻出自瓦格纳教授最近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的一个绝妙的笑话,这一笑话是这样的:经济的历史就如同在漆黑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经济学就如同在一间没有猫的日子里追一只黑猫;而计量经济学是在一间没有猫的日子里追一只黑猫,而且说猫已经抓到了!

二 “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

绝大多数关于全球化的理论都着眼于研究资本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不断增加的流动性以及由此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但若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市场”这一术语的定义是含混不清的，因为该术语一方面大量涉及了金融领域的许多不同现象，这些现象其实与通常意义上的资本并无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排除了许多资本的实际操作。所以我们必须明确什么是全球的或其他范围内的“资本市场”，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种称之为全球化的国际现象。

所谓的资本市场

在日常普通的语言中，我们把资本与生产性投资所需的资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资金用来购买生产可出售产品所必需的机器、原材料以及支付雇员的工资。在这一基点上使用资本这一词汇是可行的，因为这种用法强调了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起到的对社会有利的作用。

有关全球化的一种主要的含混不清的观念是，许多人相信流动着数以亿万计美元的所谓“全球资本市场”在某些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发展。正是因为我们以为“全球市场”与生产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我们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全球化这一概念。然而在现实中，发生在所谓的“全球资本市场”上

的大部分情况都应更多地被视为是对生产体系的冲击,而非是在向新一轮生产提供资金来源。把“资本市场”的现有形式看做是不可缺少的功能性投资机制是错误的观点。一方面“资本市场”远不止是生产性投资的漏斗,因为它除了包括大型的、多样化的有望获得未来收入的所有权市场之外,还包括各种形式的信贷、储蓄和保险,而并不仅仅是只为生产性投资提供的信贷。但另一方面它又远非是生产性投资的漏斗,原因在于,进行生产性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根本不经过所谓的“资本市场”。

关于资本市场作用的这种混淆与另一种有关合并和收购的概念混淆有关,所以人们经常以为当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时,就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资本投资。然而通常的情况是,这种资产的收购可能与新的实际投资根本毫无关系,反之,可能会发生与此相反的情况:为了能消除竞争,使资产的购买者获得更大的市场能力,收购行动可能会与减少所获资产的活动有关。在 20 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这种“资本集中化”过程在国际间飞速发展,被称为“对外直接投资”,但其实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它只是指公司所有权的变更,甚至还可能导致生产性投资的降低,而非承诺为扩大生产提供新的资金来源。

如果认为“资本市场”规模的大幅度扩大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观点就如同认为保险业的大规模扩大意味着世界正变得更安全一样,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保险业可能会在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下运作:犯罪率越高,财产保险市场越大。同样地,当可以短时间内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大笔财富时,根据经验,这种趋势说明,从社会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体系中有某种东西正运作得非常糟糕。

我们将从金融体系最显著的特点,即金融体系在提供信贷中的作用着手,探讨一些相关术语。